

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

第一輯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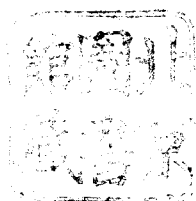
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

(一)

中国史学研究集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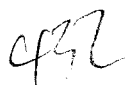
吴泽主编 袁英光选编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675

责任编辑：张哲永 史维吉
封面题字：顾廷龙
封面设计：赵文奎



· 中国史学研究集刊 ·

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

(一)

吴 泽 主编
袁英光 选编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3.8125 插页 3 字数 371 千字

1983 年 9 月第 1 版 198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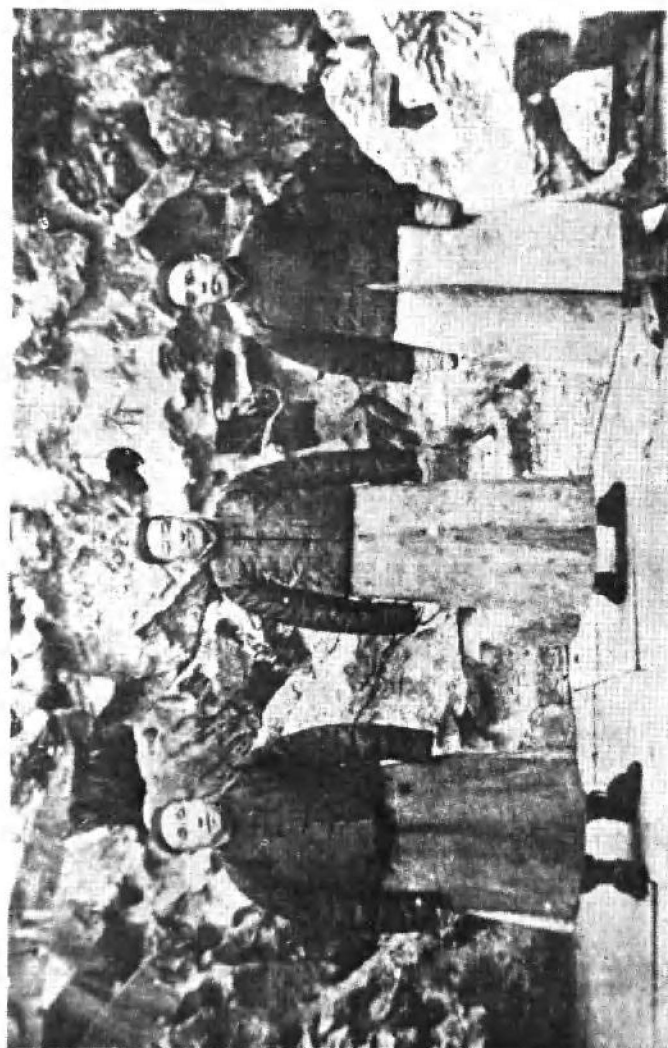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：平装本 1—7500 本 精装本 1—4000 本

书号：11135·00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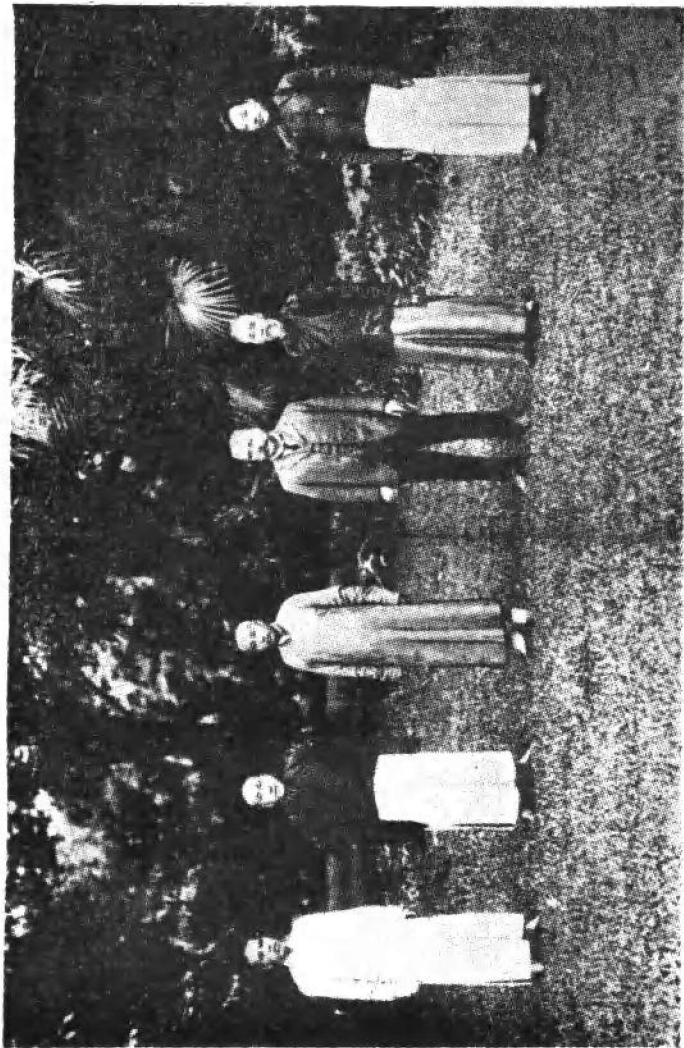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：平装本 1.80 元 精装本 2.50 元



王 国 维 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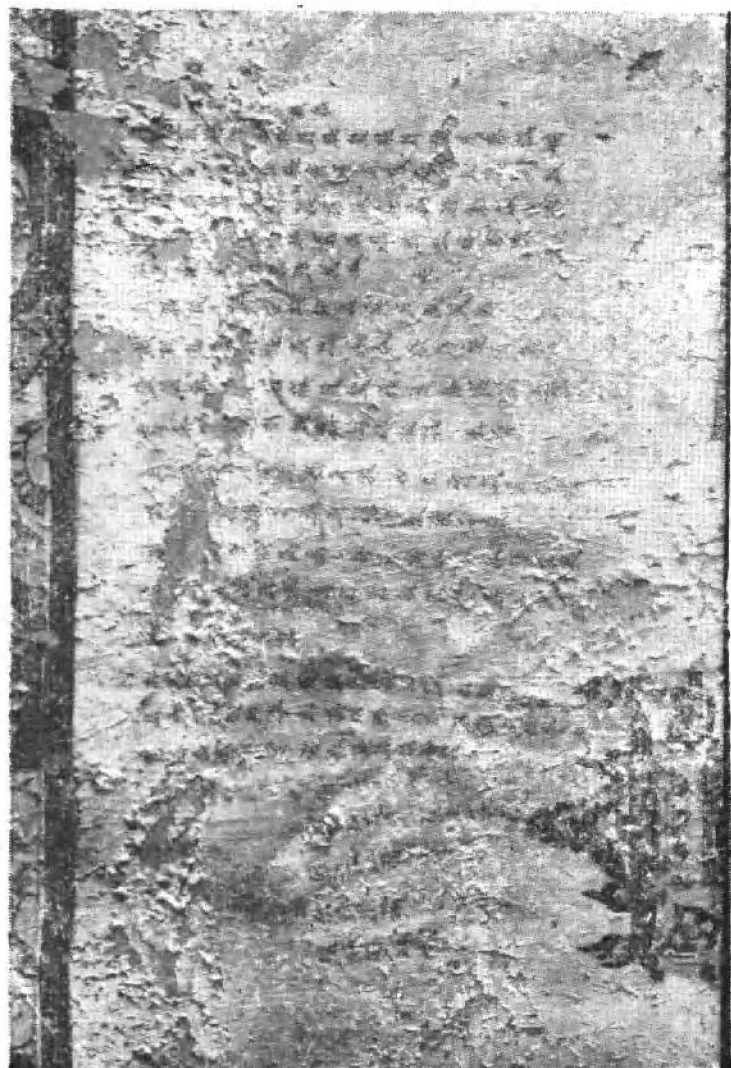
王国维(右一)、邹适庐、嵇健彰合影(见《艺术丛编》第七册)



王国维(左一)、罗振玉(左二)等合影(见《艺术丛编》第九册)



榆林窟第29洞 王圆箎后期从事西夏文研究工作



榆林題第25面

前 言

王国维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。他先后从事哲学、文学、戏曲史、甲骨文、古器物、殷周史、汉晋木简、汉魏碑刻、敦煌文献以及西北地理、蒙古史等学科的研究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，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巨大影响，享有国际盛誉。他所留下的学术遗产是丰富的、宝贵的，是值得我们学术界庆幸和珍视的。

王国维先生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后，离开我们已半个多世纪了。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各种创作、考释、校注、跋论、专文等，其中许多论断，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，证明是符合历史实际的“不易之论”，为中外学术界所敬仰。当然，其中有些论断尚属初创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，加以充实发展。同时，王国维的某些学术论点，由于当时学术研究水平的限制，以及资料、观点等方面的局限，经过国内外学者多年的反复质疑、论辨，指出了很多这样那样的疏失或错误，这些更有待于进一步研究，加以补正和提高。

建国以来，随着时代的前进，形势的发展，革命实践的深入，我们的认识在不断提高，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研究问题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。同时，在学术研究方面，古籍文献的整理，古文字学的研究，地下考古的发掘，全面地开展起来，许多新资料大批地涌现出来，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条件和依据，从而使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。我们应该在这大好的条件下，对王国维留下的这份珍贵的学术遗产，及时地作出全面深入的、实事求是的、严肃认真的分析研究和总结，以便我们批判地继承和发展，从而更好地丰富社会主义祖国的文化宝库。

为了集思广益，我们特约请全国对王国维学术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和有关研究人员，撰写专题论著，汇编成这本《王国维学术研

究论集》，以加强国内外学者的联系和学术交流，促进对王国维学术讨论的开展，提高学术研究水平。这本论集在不长的时间内，得以汇编就绪，是和王国维先生及门弟子诸老不辞辛劳，惠赐鸿文，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同志的热情支持分不开的。特在这里谨致恳切的谢意。

吴 泽

一九八二年十月

目 录

前言

- 王静安先生与甲骨文字学的发展戴家祥(1)
- 王国维周史研究综论吴 泽(15)
- 《洛诰解》献疑黎子耀(35)
- 何尊铭文和周初史实马承源(45)
- 西周金文中月相的研究马承源(62)
- 王国维对匈奴史的研究林 幹(100)
- 王国维先生书孙益庵《〈汉书·艺文志〉
举例后序》手稿跋谢国桢(遗著)(111)
- 王静安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史念海 曹尔琴(118)
- 浅议王国维关于楼兰问题的论证洪建新(132)
- 观堂手写魏石经碑式跋陈邦怀(155)
- 王国维与《水经注》校勘吴 泽 袁英光(156)
- 论王国维的唐尺研究吴 泽(168)
- 论王国维对唐史研究的贡献袁英光(191)
- 新见西夏文石刻和敦煌安西洞窟夏汉文
题记考释王静如(210)
- 论王国维对蒙古史的研究余大钧(249)
- 《盘庚篇》校笺蒋天枢(268)
- 静安先生遗著选跋赵万里(遗著)(289)

王静安诗词述论	缪 钺(329)
王国维“境界”说的两项审美标准	佛 雏(344)
王国维与中国古典戏曲史研究	卢善庆(371)
论王国维与滑稽戏	金 名(391)
王国维先生的政治思想	罗继祖(398)
王国维与罗振玉在学术研究上的关系	张舜徽(410)
王国维学术思想评价	吴文祺(420)

王静安先生与甲骨文字学的发展

戴家祥

殷墟甲骨从药材掇客转到古董商人之手，距今有八十多年历史，再从古董玩好进而为学术研究，也已七十多年。而它的史料价值，早已引起全世界史学家的重视。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工作者，是值得自豪的。

任何一种学术的兴起，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有它的发生发展过程。甲骨文所以成为一门学科，首先是建立在朱为弼、徐同柏、吴大澂等人的金文研究的基础之上，同皖南经学的体系也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。

对甲骨文试行考析的，是皖南派经学后劲瑞安孙诒让（仲容）。上虞罗振玉（叔言）及海宁王静安先生则后来居上，做出更多的贡献。孙氏一生，差不多全神贯注在《周礼正义》一部书上。为了写好《周礼正义》，不得不从事先秦古籍的精校与细读，其《尚书骈枝》、《周书斟补》、《大戴礼记斟补》、《墨子闲诂》和《扎移》等，都是《周礼正义》的副产品。他对金文甲骨的研究，虽然仅占其一生精力的极小部分，但他的《古籀拾遗》、《古籀余论》却被誉为闳通而又颇守矩矱的典范。《契文举例》成书于1904年，取材局限在一部《铁云藏龟》1058片。对于先秦古音韵的部分，也仅仅看到顾炎武、江永、戴东原、孔广森、段玉裁诸家之见。他自己的创见，并不太多。

罗叔言比孙氏晚生十八年，正值古文物大量出土的时代，他一个人收藏的甲骨，就有三万多片，与他同好的亲友，以拓片相赠送相交换的，更不知有多少。拿材料占有来讲，孙氏是不能跟他比拟的。并且罗氏的知识是多方面的，不象孙氏那样，把全部精力都放

在先秦时代。

静安先生又晚罗氏十一年。他自己虽然没有一片甲骨私藏，但较长时间和罗氏相处，后来又结成儿女亲家。凡是罗氏所能见到的，他都有机会见到。再加在少年时期就掌握了英、德、日几国文字，具有现代的科学知识。特别是由于敦煌石室唐写本古籍的大量发现，他从英人斯坦因、法人伯希和那里取得了宋以后即已佚失的隋陆法言《切韵》残本、唐长孙讷言笺注本《切韵》残本的照片。看到了蒋孟莘买到的唐写本孙愐《唐韵》残本，看到了清宫收藏的唐写本王仁昫《刊谬补缺切韵》残本。肯定唐人韵书，有关韵目的分部，部次的改动，在音理上不无贡献。1916年在上海又先后看到了极其难得的歙县江有诰《音学十书》道光辛卯（1831年）初刻本，和咸丰壬子（1852年）重刻本。1923年又在北京获见高邮王念孙《训诂韵书》的手稿本。在音韵训诂一行，囊括了七大家的所有知识，并且在周代金石文韵中证实先秦“古音廿二部之目，遂令后世无可增损”。

人们重视金文甲骨文研究，不是为了猎奇。因为学会古文字，是打开殷周史料宝库的一把钥匙。钥匙对不上号，史料宝库的门槛是跨不进的。根据孙氏、罗氏、静安先生的教导，识字这个关并不难过，但是必须具备形、声、义三方面的基础知识。形，是指从秦篆、籀文上溯到金文，由金文上溯到甲骨文，找出形体变化本身的规律，同时也不排除六国时代不规则的“古文”。《玉篇》、《一切经音义》、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、《汗简》和《古文四声韵》也或多或少残存着一些重文或者所谓异体字。但这只能排在第二位，允许有条件的利用。

声音是语言的外壳，是气流经过声带，再与喉舌唇齿各个器官不同的接触发出的音响，这是自然的物理现象。但是，由于祖国历史悠久，疆域辽阔，兄弟民族迁徙往来，使汉族语言变得复杂化了。我们只要划定了自己所要研究的先秦文献范围，就可以分别出声和韵的古今区别，或者地域区别。

从钱大昕发现“古无轻唇音”、“古无舌上音”、“古无深喉浅喉

之分”，章炳麟发现“娘日归泥”以来，近人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，对于古声母的探索又前进了一步。江有诰在论证古韵廿一部的同时，又提出通韵合韵的原则：凡是顺序紧接的两部，可以通韵，超越顺序隔部合用的成为合韵，既非通韵又非合韵的通假字，可以考虑阴阳对转这一原则。

字义是语言的内容。《尔雅》、《方言》、《释名》、《广雅》诸书，实际上是集中了汉魏以来古汉语学的所有资料，分门别类地编纂而成的工具书。清代学者郝懿行、钱绎、毕沅、王先谦又加以疏证，特别是高邮王念孙的《广雅疏证》，成绩更为可观。后来阮元的《经籍纂诂》告成，不但材料更集中更丰富，而且使用起来更方便。这些条件，三百年前的知识分子是享受不到的。

孙氏、罗氏、静安先生虽然都具备了这三方面的渊博知识，但各有自己不同的侧重点。孙氏的侧重点，比较多的从先秦语法辞例和典章制度中取得成绩，罗氏的侧重点比较多的从字形的演变中取得成绩，静安先生虽然贯彻到各个方面，但是丰硕的果实，还是“同声通假”。

三位学者在古文字研究中，不但文章写得多，更重要的是在论析形、声、义三方面，具有令人信服的说服力。即使三者之中，或许还有一点处在假设推理阶段（至少是比较合理的假设），将来有一天，或者可能得到证实。

初学金文、甲骨文的人，总觉得各个单字在众说纷纭的考释中，“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”，特别是权威学者的论点，似乎必须恭顺。这是我国在封建专制主义长期统治下，政治民主、学术民主都没有养成习惯的缘故。在金文、甲骨文领域中，颇有类似的现象。我自己在学习过程中，也遇到这种情况。例如《齐子仲姜罇》“保虞兄弟”的“虞”字，吴大澂谓即《诗》“眉寿保鲁”之“鲁”（《说文古籀补·四篇》）。罗氏1914年著《殷虚书契考释》采用他的说法。静安先生却说“虞”同“𩺰”，即古文鱼字。古鱼吾同音，“保虞兄弟”、“保虞子姓”，就是保吾兄弟、保吾子姓（《鬼方昆夷獬狁考》）。

静安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广仓学窘《学术丛刊》，民国癸亥（1923

年)编在《观堂集林·史林》，乌程蒋孟莘替他出版，罗氏早已看到，且为《观堂集林》写了序言。但是丁卯(1927年)罗氏增订本《殷虚书契考释》不采用他的话，仍用吴大澂释“虞”为“鲁”(卷中七三页)。吴大澂在古文字学界有崇高的声誉，不但罗氏推重，静安先生也称道他的古文字“尤有悬解”(《毛公鼎考释序》)。罗氏一再采取他的话，其中必有奥妙的道理。我冥思苦索的结果，却为吴大澂找出一条歪理来。

齐鲁两国世代互为婚姻，鲁桓公的妻子——文姜，是齐釐公的女儿(襄公的妹子)(《左传·桓公十八年》)。鲁庄公的妻子——哀姜，也是齐釐公的女儿(桓公的妹子)(《左传·庄公廿四年》)。齐襄公的次弟公子纠，却是鲁女所生(《史记·齐世家》)。鲁成公的妻子——穆姜，又娶自齐国(《左传·成公十四年》)。齐灵公的妻子——颜懿姬却娶自鲁国(《左传·襄公十九年》)。作为铸造罍钟的仲姜，对鲁国致以兄弟般的祝愿，自属情理之中。假使吴大澂看到《沈儿钟》“虞以宴以喜”的话，一定又会扯上了《鲁颂·閟宫》中“鲁侯宴喜”这句话了。这样一来，便把吴大澂的观点，上升到领先的地位。

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，我初步学得一点音韵学常识，发现《说文解字》里有一些合体字，既非形声，又非会意，而两者都算音符。这才想到“虍”读荒乌切，晓母鱼部，“鱼”读语居切，疑母鱼部，“虞”字从虍从鱼，是上下谐声字。也就是说，“虍”在同部字的上面，许多地方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。例如“呜呼”可以写为“呜噓”，“吴仲”可以写为“虞仲”，“鲜吴”可以写为“鲜虞”，“斂人”可以写为“斂人”。早在光绪癸卯(1903年)，孙氏事实上已经考定“虞”即“虞”字的或体(《古籀余论·卷三》)。

后来在山西省代县蒙王村，发现一个青铜古器，铭曰：“攻吴王夫差，择其吉金自作御监”。丹徒(镇江)刘鹗(铁云)购得一个铜钟，铭曰：“工斂王皮難之子者减自作□钟”。安徽寿县出土的铜戈，铭云：“攻斂王光自□”。解放以后，在河南省辉县琉璃阁发现铜剑，铭曰：“攻斂王夫差自作其元用”。淮南蔡家岗赵家孤堆出土

的铜剑，铭曰：“工𡩂王太子姑僂𡩂反，自作元用……”。《左传·宣公八年》“盟吴越而还”。孔颖达《正义》“太伯仲雍让其弟季历，而去之荆蛮，自号句吴，‘句’或为‘工’，夷言发声也”。“工”“攻”古音隶东部，“句”隶侯部，东、侯阴阳对转，是工𡩂、攻吴、攻𡩂、攻𡩂就是句吴，这个科学的推断，从考古发掘中完全得到证实。“鱼”“吾”同音，“吾”从“五”声，“五”“午”通假，所以《说文·五篇》“𩺰”字重文作“𩺰”。由此可见，“保𡩂兄弟”、“保𡩂子姓”、“𡩂以宴以喜”，非读“𡩂”为“吾”不可。

“𡩂”“鲁”两字，虽然同隶鱼部，但“鲁”隶来母。鲁《𡩂生鼎》作𡩂，《周公簠》作𡩂，象以器盛鱼形，《𡩂敖簠》作𡩂，从皿（金文智作𡩂，魏石经《君奭》残字智古文作𡩂，知从皿，与从𠂔同），郭沫若释为“𡩂”之古文。“鲁”、“𡩂”不仅同部，又是同母，同声通假，都可为“旅”。郭沫若很有灼见。《秋官·司仪》“皆旅𡩂”，郑玄注：“旅，读为鸿𡩂之𡩂”。《仪礼·士冠礼》“旅占”，郑玄注：“古文旅，作𡩂”。班固《汉书·叙传》“大夫𡩂岱”，《集注》引郑氏曰：“𡩂岱，季氏旅于泰山”。这是“𡩂”可通“旅”之证。“旅”亦同“鲁”，《说文·七篇》：“旅，古文以为鲁卫之鲁”。《书序》“旅天子之命”，《史记·周本纪》作“鲁天子之命”。《释名·释船》“櫓，旅也”，也用声源来解语义。“鲁”本象形，“𡩂”为形声，由象形变为形声，乃六书隶属再分例。“𡩂”或作“旅”，“旅”亦为“鲁”，乃同声文字假借例。如依吴大澂释“𡩂”为“鲁”，用以解释《齐子仲姜𡩂》、《沈儿钟》的铭文，或许可以自圆其说，用在《林氏壶》“𡩂以为弄壶”，《栾书缶》“𡩂以祈眉寿”，那就不可理解了。

我当时在两种考释中，所以弄得不知选择，主要是自己对音韵一行愚昧无知，同时也受了迷信权威思想的影响。

在一定的时间之后，由一无所知到稍有所知。看到罗氏、静安先生认为“字不可识”的“𡩂”字（《殷虚书契前编·卷八》七页三片）大胆地释为“𡩂”的异文。后来居然看见孙氏在《兮甲盘》考释中已有此说，于省吾也同样释𡩂。

我的认识是通过《玉篇·五十六》“否”，“蒲鄙切”；《大雅·云